



江山语言学丛书 刘晓南 著

汉语历史方言研究

● 上海人民出版社



江山语言学丛书 刘晓南 著

汉语历史方言研究

●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历史方言研究/刘晓南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江山语言学丛书)

ISBN 978-7-208-07697-6

I. 汉... II. 刘... III. 汉语-历史方言学 IV. H1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09948号

责任编辑 朱慧君 曹勇庆

封面设计 杨德鸿

· 江山语言学丛书 ·

汉语历史方言研究

刘晓南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0.5 插页 2 字数 269,000

2008年4月第1版 200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250

ISBN 978-7-208-07697-6/H·33

定价 27.00元

江山语言学丛书总序

南京,虎踞龙盘之地,自公元3世纪以来,文化日益发展,学术日臻发达。即以近代而论,明代的南京太学,是当时最早创建的最高学府。《洪武正韵》的主编宋濂曾任南京太学的司业,光照汗青的郑成功是南京太学第280年入学的学生。及至清代,著名学者两江总督张之洞于1902年创办三江师范学堂,延至民国时的中央大学,杰出的语言学家黄侃、方光焘、吕叔湘等先后执教于此。近五十多年来,南京大学的语言学科取得了长足进步,为国家培养了众多人才,2001年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南京大学语言学科诸同志如今躬逢明时,奋发图强,出版这套丛书,以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贡献绵薄之力。

古语云:“入山唯恐不深,入林唯恐不密。”一本著作,一套丛书,如果是学术性的,学界同仁会提出要求:

第一,坚实。中国古代大思想家、大教育家朱熹说过:“如人要起屋,须是先筑,教基址坚牢,上面方可架屋。”时下甚嚣尘上的急功近利导致大言欺人、浮辞充斥、硬伤时见,等等,如此岂能自立于世界学术之林?

第二,会通。学人凡有志者必有追求。追求什么?追求的是超胜。明代大学者徐光启说过:“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会通就是兼收并蓄,融

会贯通。

第三,创新。超胜的正道在创新,19世纪西方著名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说:“人间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源于创新。”学术,唯有创新方有自家的灵魂。创新之中,最难的,也是最高的,是自主创新,亦即原始原创。

这三点,当为学人悬作标的。自我评估,我们与之距离甚远。但是,有登山的志趣,纵然未必能达峰巅,或可至山腰,但至少是在攀登中;若连登山的愿望也无,那只能老死于山麓。

这套丛书冠名“江山”,“江”者,长江也;“山”者,钟山也。

鲁国尧

二〇〇七年五月四日

目 录

- 江山语言学丛书总序 / 001
- 汉语历史方言语音研究的几个问题 / 001
- 宋代文士用韵与宋代通语及方言 / 026
- 朱熹与宋代方音 / 045
- 从历史文献的记述看早期闽语 / 056
- 宋代福建诗人用韵所反映的
10 世纪到 13 世纪的闽方言若干特点 / 079
- 从宋代福建诗人用韵看历史上吴语对闽语的影响 / 108
- 宋代福建文士用韵中的阴入通押现象 / 117
- 南宋崇安二刘诗文用韵与闽北方言 / 123
- 朱熹与闽方言 / 133
- 朱熹诗经楚辞叶音中的闽音声母 / 162
- 从宋代邵武文士用韵看历史上
邵武方言的特点及其归属 / 201
- 《诗集传》支思部独立献疑 / 223
- 宋代闽音次浊声母清送气现象 / 235
- 宋代四川诗人用韵及宋代通语音变若干问题 / 250
- 宋代四川诗人阳声韵及异调通押中的方音现象 / 270
- 宋代四川诗人阴声入声韵通押中的方音现象 / 290
- 《韵会》𣎵字母韵考论 / 309
- 后记 / 328

汉语历史方言语音研究的几个问题^①

一 文献与口语：音韵学方音研究传统的反思

汉语历史语音研究有着悠久的传统，如果从三国时魏李登《声类》算起，至今约有 1 800 多年。可以 20 世纪初为分界线，将其区分为传统语言学和现代语言学两个发展时期，两个时期对雅言通语（跟文献记载的书面语言相关）与方俗口语研究的态度是不同的。仅从方音研究史的角度看，音韵学经历了一个由俗入雅又由雅入俗的否定之否定过程，即早期研究以方音为主，《切韵》出现后就形成雅音传统，直到明末才又注意方言，此后现实方言音系的调查与研究逐渐成为主流。

1.1 音韵学史上见诸记载的第一部韵书是三国曹魏时（220—265）李登《声类》，直到隋代陆法言《切韵》（601 年）出现，才有了第一本全面描写汉语标准语音系的韵书。从《声类》到《切韵》之前的 300 多年，汉语音韵学研究以方音为主。南北朝颜之推概括这一时期的音韵研究为“音韵锋出，各有土风，递相非笑，指马之喻，未知孰是”^[1]，从颜氏这个评说中，可见当时各种韵书都饱含土风，即方音，各不服气，互相指责，莫衷一是。当然这也跟当时国家分裂，政治不统一有关。隋的统一，带来了文化建设统一的可能与要求，萧该、颜之推等人的长安论韵，催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记录汉语标准音的韵书《切韵》。《切韵》的“切”，应当就是颜之推所说“唯见崔子约、崔瞻叔侄，李祖仁、李蔚兄弟稍为切正”的“切”，“切”者，正也。“切韵”的书名就是“正音”^[2]的意

① 原载《励耘学刊》第一辑，2005 年。

思。这本新出的韵书“酌古沿今，无以加也”（《广韵》长孙讷言序），比较之前的韵书，几乎达到完美的境地。因而适应统一帝国的需要，立刻被用作科举考试的用韵标准，成为官韵，带上法定色彩。学理上的巨大成功，加以实用上权威地位的确立，使之风行天下。王国维曾推测：“唐人盛为诗赋，韵书当家置一部，故陆、孙二韵，当时写本当以万计。”^[3]试想此时还有谁去读满纸“土风”的早期韵书呢？更不要说描写研究那些土音了。由此衍生出语音求正存雅的传统，可以说音韵学方音研究的传统随着《切韵》的面世而中断了，代之以《切韵》为代表的雅音研究传统。

《切韵》的出现是一个里程碑，以此为转折点，汉语音韵学摒弃方音研究约达千年。音韵学人将当时五方异同之音，均看作音讹。早在《切韵》成书之时，陆法言就批评：“吴楚则时伤轻浅，燕赵则多伤重浊，秦陇则去声为入，梁益则平声似去。”晚唐的李涪更是言辞激切，其《刊误》卷下云：“夫吴民之言如病瘡风而噤，每启其口，则语戾喎呐，声随下笔，竟不自悟。凡中华音切，莫过东都，盖居天地之中，禀气特正。”元代《谈选》^[4]云：“寇莱公与丁晋公同在政事堂日，闲论及天下语音何处为正。寇言惟西洛人得天下之中。丁曰：不然，四远各有方言，唯读书人然后为正。”这种语音求正思想贯彻于行动，体现在教育，颜之推说：“吾家儿女，虽在孩稚，便渐督正之，一言讹替，以为己罪矣。”^[1]直到宋代，还有“王沂公见子侄语话学人乡音，教人举止，必痛抑之”的记载^[4]。

千余年间音韵学家追求切正、标榜雅音，企图设计一种音系通天下之音。编写韵书均取求正存雅的态度，以图纠方言、通天下、存正统，尤以切韵家^①为突出。如张麟之《韵镜识语》云：“不出四十三转，而天下无遗音”，此乃求其通。《四声等子·序》云：“按图以索三百六韵之字，

① 宋元切韵学，明清称为等韵学。参鲁国尧《卢宗迈切韵法述评》，原连载于《中国语文》1992年第6期、1993年第1期。收入《鲁国尧语言学论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改题《〈卢宗迈切韵法〉述论》。

虽有音无字者犹且声随口出,而况有音有字者乎!遂得吴楚之轻清就声而不滥,燕赵之重浊克体而绝疑,而不失于大中至正之道,可谓尽善尽美矣”,此为求其正。这种现象直到明代才改观,出现了新的方言韵书,如王应电《声韵会通》(1540年),闽音韵书《戚参军八音字义便览》等。但“方音错讹”的观念完全改变是20世纪初的事了。

不过,若仔细追究起来,明清时对方音态度的改变,其源头当溯至宋代。从宋代开始,学者从两个方面关注方音。一是语音已经演变,昔日之标准音书已不合当时之口音,如洪迈《容斋五笔》卷八“《礼部韵略》非理”条云:“《礼部韵略》所分字有绝不近人情者,如东之与冬、清之与青至于隔韵不通用,而为四声切韵之学者,必强立说,然终为非是。”他举“静”与“靚”字为例,批评韵书“以静为上声、靚为去声”,将本同音的两字强分两调,以至于不能通押。查《广韵》“静”为静韵疾郢切,全浊上声;“靚”为劲韵疾政切,全浊去声,洪氏引经据典论证“静、靚”同音,其实宋代浊上变去,是实际语音变为同音字而已。宋人已经看到了韵书与实际语音脱节,因而关注语音的现状,在韵书韵图中零零散散反映当时语音越来越多。实际语音中当然就有方音,如《集韵·之韵》收录“来”字的又读陵之切,这就是一个吴音^[5]。又如《集韵·猕韵》收“圉”字云:“闽人呼儿曰圉”,音九件切,是闽方言词,所收之音当然是闽音或闽音的折合。两宋时期编的各种韵书或多或少都包含方音,但不系统。

二是兴起于宋代的古音研究,一开始就注意到方音与古音的关系。吴棫在《毛诗补音》和《韵补》中就引述当时方俗语音以证古音,如吴氏指出止摄开口三等精庄组字在俗读中其韵近鱼虞,其实就是宋代闽方言读音^[6]。宋代大儒朱熹加以发挥,形成“方音与古音相通”的观点。《朱子大全》卷七一云:“大抵方言多有自来,亦有暗合古语者。如……闽人有谓口为苦,走为祖者,皆合古韵。此类尚多,不能尽举也。”又《朱子语类》卷八十,有学生问:“《诗》音韵间有不可晓处。”他答道:“如今所在方言,亦自有音韵与古合处。”明确提出方音与古音暗合的观点。《朱

子语类》这条语录是他的学生钱木之所记，木之所记出于《池录》，乃丁巳年(1197年)所闻，时朱熹67岁，离逝世只差3年，看来他对于方言可以与古音相合的认识是老而弥坚。反复申述同样观点，应当反映了他这一见解是成熟的考虑^[7]。

朱熹所说方音与古音“暗合”，应当包含两点意思，其一：方言与古音相合不是巧合，无论它与古音相近还是相同均当视为“古之遗声也”^[8]，是古代语音小范围残存的遗迹。这几乎就是在说，方言中不同程度地保留了古音，既然如此，古书中反映的古音同样可以用方言来说明。其二：与古音相合，“方言多此类”，就像建州人把走念成祖，口念成苦，例子很多，不能尽举，学者可以类推。

后来项安世《项氏家说》更为系统加以推阐。方音与古音可互相发明，对于重视传统“好古”的古代学者来说，无疑会引导他们重视方音。

宋人注重实际语音，用方音研究古音，两股潮流汇合至于明清，终于涌现出一批记录当时实际语音的韵书。据耿振生《明清等韵学通论》^[9]考索，明清方言韵书可分为吴、闽语方言韵书等若干种类。然此时方音正讹的观念并没消失，如成于清嘉庆五年(1800年)的闽音韵书《汇音妙悟》自序云：“疆域既分，乡音各异，山陬海澨，与中州之声韵迥殊”，为了解决“临文操觚，声律不谐，应酬失次”等问题，故编写《汇音妙悟》，“辑为闽音，必辨一书，于唇喉齿舌，分别厘然，乡里后生，熟复之可无为方言之域矣。”可见这些描写方音的韵书出于临文声律之需、斤斤于破除“方言之域”，求正通雅。传统的音韵学研究方音主要目的是为了打通方音之隔阂，以雅正俗。见于文献记载的雅音仍是求正存雅的标准，以文献雅语正方音或通方俗是其目的。

1.2 现代语言学对方音研究的态度与传统迥然有别。据罗常培《汉语方言研究小史》^[10]介绍，现代语言学对方言的兴趣，起自对俗文学的收集与整理。1918年北京大学发起征集民间歌谣，发现民歌中许多方言词无法记写，引起对方言的关注。1924年北大成立方言调查

会,开始调查方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后开始了方言普查。赵元任是现代方言学之父,他的名著《现代吴语的研究》刊于1928年。可见在方言研究史上,20世纪初是一个转折点,就是由传统语言学的方言研究转变为现代语言学的方言研究。这个转变的特征就是从以文献雅言为正的考证与纠偏转为实际口语的描写与记录,旧有的重视文献雅语的方言研究传统被摒弃。由此发生的新的方言学,即以地域口语为研究对象,偏重音系记录,平面描写。这样一来,音韵学在一个新的研究层面上又回到口语方音为主的传统上来了。

研究必须立足于事实,对现代方言的研究必须以对现代方言的了解为前提,所以方言普查是必要的。但到一定的程度,平面描写就显现出其弱点,因为它不能说明方言之间的关系,不能深入了解方言的本质,调查的点越多,也只是显示掌握方言资料的“量”的扩张而已。罗常培曾经批评近代西洋人对当时方言的调查与研究是“出发点错误”,他说“从前西洋人研究中国现代方言的大缺陷,就是没有历史的出发点”^[10]。他接着说:“如果没有历史的出发点,我们哪能知道它们(晓南按,指同一个字不同方言中不同发音)彼此的关系呢?再说,无论拿哪一种现代方言作研究别的方音的出发点,事实上往往都走不通。”因此,罗先生一方面说:“要想弄清楚汉语音韵史每个时期的方音系统,更应该彻底弄明白现代的方音系统。”另一方面他更强调:“研究现代方音惟一有效的出发点就是古音。”他所说的“古音”包含古代方音。这个出发点很重要,当现代方言平面调查已经普遍展开的时候,尤其如此。从出发点来看,要说明现代方音系统,必要弄明白历史方音。所以,推动现代方言研究深入的途径之一就是加强对方音的历史考察。

1.3 改革开放以来,方言学界逐渐认识到方言研究的深入,有待于方言史的研究,因而开始转向现代方言的历史比较。最近出版的一批著作,如刘纶鑫《客赣方言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王临惠《汾河流域方言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年),曹志耘《南部吴语语音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等,都有历史比较的内容,企图通过现代方言的比较研究说明其历史来源。这预示了一个新的趋势,即继由上世纪初的文献语言的历史考索转向现代口语的平面描写之后,重心将转向以比较研究为特征的历史考察。

显然这个新转变态势包含了方法论的更新,即运用历史比较法对现代方言进行研究。但从现有成果来看,现代方言学的历史研究重心仍留驻于现代方音亦即现代口语基础之上,表现出对历史文献语料的某种程度的忽视。作历史方言研究忽视历史文献语料,不仅仅是对某种语料的态度问题,其实质也是一种方法论问题。不同方法会运用不同的语言材料,不同的材料也适应不同的方法。

当然,对于历史方言研究来说,现代方音有许多优点。它音系完备,自成系统,代代相传,层层积淀,遗传变异各具特征,语音差异毫厘毕现,保留了许多历史方音现象,是进行历史方言研究的宝贵资料。但不能过高估价这些语料,因为经过历史长河的冲刷、淘汰,沉淀下来的历史语音恐怕已不成系统了,有的磨损了,有的变异了,有的失真了,还有的消亡了。对闽方言史有杰出贡献的美国汉学家罗杰瑞^[1]说的“表明最古老层次的方言证据总是零碎的,对某些特点的保留和丢失,显得不平衡”确为经验之谈。用作历史方言研究,则现代方言语料有三大缺陷。其一,从现代方言内部差异拟测古代方音,所得仅为—合理的假说,立足点不同即可得出不同假说,所以,假说是有必要证实的。现代方音语料无法做到确证古代语音的现实。其二,现代方音不具备古代文献语料的历史断代的功能,也无法仅凭现代方言判断其所保留古音的历史层次。因而对历史比较得出的古代方言作大致准确的断代还得依靠古代文献。其三,通过对现代方音口语内部差异的比较研究,可推知其历史形式,但若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某一方言现象在现代方言中没有留下痕迹,则此种比较就无从下手了。所以,历史方言学利用现代方音进行历史比较研究,仍然离不开历史文献。

汉语拥有 2 000 多年连绵不断的传世文献,地下出土文献还可以上推很多年,这些文献大多数年代确定,能给方言史提供语料。文献语料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确证古代方言特征的存在,可以给历史方言的考究准确断代,可以考查历史上确曾存在过的方言现象,从而揭示方言特征的演变与消长。而最大缺点就是汉字非表音的特性,使“楚夏各异”的方言文献无法一目了然地显出其方俗差异。隐含其中的方言语料须爬罗剔抉索隐钩沉,去挖掘,去发现,所得常常是零篇断简,显得零碎。但仍要指出,以文献研究方言史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至少有如下三点:1. 历史方言文献资料非常丰富,韵书、字书、音释、诗词用韵、笔记小说、文集、经传注释、译音借词等都有方俗语料记录或痕迹。2. 历代人口迁徙的资料大致准确,如客家迁徙,湖广填四川等,极有利于语言异动或语言接触的考察。3. 更重要的是由于质补学风的影响,我们祖先留下的文献往往具有很大的可信度,唐代以后文献的记载大多现今仍可以实地考证,文献上的方言现象大多在现代方言中还有遗存等等。

因此,现代历史方音学研究无疑应当将文献和口语两种语料结合起来,在研究方法上,就是传统的文献考证法与从西方引进的历史比较法的有机结合,这是现代历史方言研究中的新的二重证据法^[12]。历史文献中或隐或显包含方言语料,现代方言口语或多或少遗存古代方言特征,都是研究汉语历史方言的重要材料。对汉语历史方言的研究角度和重点可以有所侧重,可以立足古代文献,下探现代方言;也可以立足现代方言,上溯古代文献。无论从何种角度切入,历史文献考证和历史比较法两种研究法均须互为表里,文献与现代方言的材料不可偏废。

二 原始方言假说的检讨

2.1 西方汉语学界的历史方言研究却是以“原始方言”为其号召的,原始方言假说来自欧洲历史语言学的印欧语研究模式,这与其本土



的研究看重文献语料不同,汉语原始方言假说忽视文献语料。这是有原因的,第一,记录汉语的汉字不是表音文字。第二,与汉语有亲属关系的语言很少有古代文献。这确是按照印欧语研究模式对汉语进行历史比较的大困难,如上世纪20年代,俄汉学家刚和泰在其《音译梵书与中国古音》一文中就指出了这两点。可见,汉语文献不能一目了然地表现历史语音,似乎一开始就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上世纪60年代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一批汉学家提出“普林斯顿假说”(Princeton hypothesis),主张以现代汉语的活语言来研究古代汉语。这比他们的先驱进了一步,他们在现代汉语与原始汉语之间增加了一个中间环节:原始方言。设想在上古汉语的研究中,先构拟各原始方言,再在原始方言基础上构拟原始汉语。进行以流溯源的逆向推导,直接从现代方言推求原始方言,再从原始方言推求原始汉语,其操作流程可图示如下:

活方言→原始方言→原始汉语

显而易见,这个流程图中可以不需要文献语料,或者说不必依据文献语料,这就跳过了文献这一难关。

普林斯顿学派的学者从现代方言来推古代方言,已发表了不少论著,对汉语的闽语、官话、湘语、客家话等方言的原始语音作了许多研究,取得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成果,但也遭遇到许多批评^[13]。如李方桂^[14]在一次谈话中,指出罗杰瑞(Jerry Norman)原始闽语构拟有两个缺陷,其一,“如果像罗杰瑞那样运用闽方言的话,所能构拟的词汇如此之少,以致不能追溯到上古汉语时期。”其二,重构出来的原始闽方言,“其历史到底有多久无从得知。”这是李先生在非正式交谈中表示的看法,用语随意。我们可以将这一批评概括为两点:一、原始方言研究缺乏广度和深度;二、原始方言不能断代。第一点主要针对其概括面而言,能构拟的词汇太少,所以不能深入。但这还似乎并非其要害,因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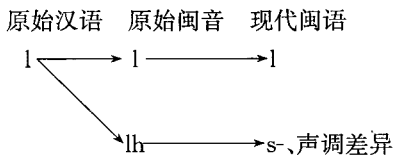
可以想见,全面应用方言内部差异语料,是完全可以构拟出一个古方言音系的。如日本学者秋谷裕幸《南部吴语古音构拟》^[15],就利用现代吴语处衢片常山、江山、玉山、广丰四个方言点,构拟出南部吴语的原始语音系统:声母 29 个、韵母 77 个(其中阴声韵 30、阳声韵 24、入声韵 23)、声调 8 个。显然这是一庞大体系,用功之勤,材料之富,令人赞叹。但由于是基于方言点之间内部差异的比较拟测,在方法上主要根据语音对应关系作就同别异地概括,类似于从分不从合、取最小公倍数的做法,因而所得实际上已是一个“综合音系”,是否为处衢片吴语的共同源头,可能还是一个有待验证的假说。至于李方桂说的“不能断代”,这确实是原始方言说的要害问题。但还不止于此,徐通锵在《历史语言学》^[16]中已经从理论上对历史比较法局限性作了全面论述。

2.2 在闽语历史研究中,美国汉学家罗杰瑞利用现代闽方言的内部差异,推导原始闽音的声母,这是运用活方言语料进行历史比较研究汉语方言的著名范例。他从 1973 年起,陆续发表了若干篇论文,形成了一个系列。其中重要的有:Tonal development in Min,刊于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第 1 卷第 2 期(1973 年),该文由张惠英以《闽语声调的演变》^[17]为题译为中文,刊于《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5 年第 4 期。此后罗杰瑞又陆续发表了《原始闽方言的声母》^[18]、《闽北方言的第三套清塞音和清塞擦音》^[11]、Voiced initials in Shyrbei(《石陂话的浊声母》)^[19]等文章。在这些文章中,罗杰瑞为原始闽语声母提出了一个合理的假说。假说包含两大内容:1. 原始闽语声母系统中具有一套“清送气鼻音和边音”,2. 原始闽语塞音、塞擦音中含有清浊送气不送气和弱化的“六套辅音声母”。之所以持此看法,是基于现代闽语一些字音具有与汉语其他方言在声母、声调上不相一致的表现,解释这些现象须作来源不同的推测。如由于次浊声母字的声调演变中“有一套响音声母字声调的演变,正和送气浊塞音声母字相对应”,所有次浊声母字声调演变对应于全浊字的送气和不送气两类,所以,他认为原始闽语包含

有两套响音的声母音位：

浊音	m	n	ń	ŋ	l
清音	mh	nh		ŋh	lh ^[17]

1973 年的文章中，罗氏给这套清鼻音清边音提供的字例是很少的，mh 有“麻”等 10 字，nh 唯有一“年”字，ŋh 仅“艾”等 3 字，只 lh 略多一点，有“笋”等 19 字，这就是李方桂批评的“能构拟的词如此之少”所由来。不过，我以为罗氏所作工作是就闽语现有之音类来论说其可能之来源，这个音类原本存在于闽方言各点之中，分类大同小异，只不过音值表现参差而已。其原始闽语研究主要就是将方言内部音值不统一但分类大致相同的音类，作一个共同来源的音值拟定，这实际上是做了一个方音中某音类的古音重建的工作，本质上与高本汉构拟《切韵》音没有什么不同。以中古来母为例，古汉语来母在现代闽音中有一部分字声调演变不合常规，还有一部分字在闽北音中读 s- 声母，这些字被认为来自清送气边音。图示如下：



罗氏的论文只告诉我们从现代闽语到“原始闽语”这一段，没有涉及音类分化问题。其实这个源流图中还有更重要的一段就是从原始汉语的 l- 到原始闽语的 lh- 之间的变化，历史上有没有过从 l- 到 l-、lh- 的分化发展？亦即原始闽语的这个 lh- 是怎么来的？罗氏的文章只是就现代闽语既有音类来解释原始闽语音类的共同音值，所以我认为实际上只是做了一个古音构拟工作，而原始闽语与原始汉语之间可能存在着音类差别及其来源等问题，更应当作出说明，可是迄未见有关论文，此其一。其二，如果仅就同一音类不同音值表现的语音现象作出古

音构拟,这本身仍是一种假说,是需要证实的。只是停留于假说阶段的话,则相同的语音表现由于研究者观察角度不同,是可以得出内容完全不同而同样很有道理的假说来的。就以闽方音中这些特殊语音现象来说,目前除罗杰瑞的原始闽语假说以外,至少还可以举出张光宇^[20]的“气流换道”说,平田昌司^[21]的“吴闽接触”说,王福堂^[22]“引入吴语吸气音”说。语言的真实只有一个,究竟何说符合真实,不是需要证实吗?其三,原始闽语说的“原始”到底是什么时代呢?李方桂先生提的“其历史到底有多久的”问题也是不能忽视的。

关于罗杰瑞假说是否可以证实的问题。我利用宋代闽方言的历史文献,考实了清送气鼻音边音声母在宋代闽语中确有遗存,从而证明早期闽方言有过清送气鼻音声母是可信的^[23]。至于“六套辅音声母”,在宋代闽音语料中还没有发现可以证明其存在的证据,要么这个特征本来就不存在,退一步说,如果历史闽语确有这么一个特征,从宋代文献罕见其痕迹来推测,那也是早就消失了的特征^①,跟清送气鼻音边音不处于同一时代层面。

关于音类分化的来源问题。我在同一篇文章中对清送气鼻音边音声母也作了进一步考证,有资料显示宋代闽音中残存的清送气鼻音边音声母与汉魏西北语音一脉相承,其共同来源是上古汉语语音。问题随之而来,很显然,就清送气鼻音边音这一点来说,越往上推它越接近共同汉语,越非闽语所独有。从魏晋往下看,到宋代它已是行将消失的遗存现象,无论如何都很难说它在什么时候才是完备的闽语独有的原始特征。与其说它在宋代的表现是原始闽语,还不如说它只是比别的方言较长久地保留了上古汉语声母。

2.3 这些考证实际上已经是对原始方言在“原始独立性”和“时代

① 平田昌司^[21]也指出“六套塞音,在传统汉语音韵学文献以及汉字诸声系统中可能找不出任何旁证”。